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提升路径探析

吕守军 王一伊 杨柔

摘要:党的二十大将“增进民生福祉”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核心目标。传统福利经济学以效率至上和个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难以揭示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福利的动态演变逻辑。本文创新构建网络状理论框架,横向贯通基本生存、人的发展、自然生态三层面,纵向贯穿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双主线。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呈现双重变化:从社会利益维度看,福利总量提升且结构优化;从社会公平维度看,福利分配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基于此,提出兼顾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强化劳动技能治理、推动人技融合共生、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社会福利提升路径。

关键词:数字经济;社会福利;理论框架;提升路径

DOI: 10.13806/j.cnki.issn1008-7095.2025.011.002

引言

党的二十大将“增进民生福祉”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展目标,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①然而,数字经济时代,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高企、生态环境大范围破坏等传统社会福利问题依然存在,同时产生了零工经济低社会保障覆盖率、数字平台消费主义盛行等一系列新困境,加剧“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对“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构成了严峻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来缓解社会矛盾、维系资本主义统治。^②西方福利经济学主要围绕帕累托改进展开,^③并总结出两条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的具体路径:一是直接通过数字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驱动,提升经济效率;^④二

作者简介:吕守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200030)。王一伊,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30)。杨柔,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上海,200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研究”(22ZDA052)。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46页。

^② 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③ R. W. Boardway, N. Bruce, *Welfare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 62.

^④ OECD, *Tax Challenges Arising from Digitalization - Interim Report 2018: Inclusive Framework on BEP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Publishing, 2018, p. 195.

是间接通过普及人工智能应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信息透明度并改善基础设施。^{①②}

当前针对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研究,普遍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将效率改进视为推动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的核心动力,倡导“以发展谋福祉”的重要战略。^③然而,既有研究逐渐揭示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区别于西方福利国家的本质差异:其一,中国模式强调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尤其注重市场初次分配的公平正义。^④研究表明,数字资本通过攫取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福利分配不平等,^⑤抑制了中国社会福利水平提升。其二,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表征着新经济形态下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直接关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⑥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福利治理模式以增进人民利益为根本动力,^⑦超越西方福利国家模式忽视部分群体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以及生态可持续性的固有局限。^⑧这些研究证实,现有奉行效率至上和个别利益最大化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框架,难以系统揭示中国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动态演变逻辑与提升路径。

鉴于此,为实现“增进民生福祉”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本文突破既有理论桎梏,构建了网络状分析框架,其理论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涵盖基本生存、人的发展、自然生态三个横向层面与社会利益、社会公平两条纵向主线的社会福利理论框架;第二,基于双主线与三层面的动态交互作用,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双重演变规律;第三,据此提出兼具中国特色与实践效能的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系统提升路径。

一、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福利理论框架

20世纪20年代,为缓和社会矛盾、维持资本主义发展,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福利经济学应运而生,旨在“提供一个框架,并就一些经济状态是否对整个社会而言好于另一些状态做出有意义的陈述”。^⑨一百多年来,为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福利经济学围绕如何对社会状态进行完全排序,经历了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之争,最终将帕累托标准确立为衡量社会福利的基本原则。当补偿原理与社会福利函数因难以提供充分的人际效用比较信息而陷入理论困境时,阿玛蒂亚·森基于社会选择理论进行关键突破,将社会福利内涵从效用拓展至蕴含价值判断的可行能力,实现社会状态的完全排序

-
- ① J. S. Pedersen, A. Wilkinson, “The Digital Society and Provision of Welfare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vol. 38, no. 3/4(2018), pp. 194—209.
- ② I. Reimers, J. Waldfogel, “Digitization and Pre-Purchase Information: The Causal and Welfare Impacts of Reviews and Crowd Rat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1, no. 6 (2021), pp. 1941—1971.
- ③ 房莉杰、潘桐:《以发展谋福祉: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路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第79—98、206页。
- ④ 郝书翠:《福利主义的源流、本质及其危害》,《人民论坛》2022年第19期,第56—59页。
- ⑤ 刘诚:《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4期,第25—35页。
- ⑥ 陈周旺:《福利治理为什么重要:超越福利国家模式》,《行政论坛》2021年第28卷第4期,第26—33页。
- ⑦ 卫小将:《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62卷第5期,第59—71、236页。
- ⑧ 孔明安:《论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的共同富裕对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超越》,《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6期,第43—52、155页。
- ⑨ R. W. Boadway, N. Bruce, *Welfare Econom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4, p. 137.

并推导出社会福利水平。^①然而,福利国家实践显示,其现实社会福利水平远未达到福利经济学的理论预期。

究其根本原因,福利经济学在探讨社会福利时存在显著的矛盾与冲突。福利经济学将社会福利的内涵从衡量社会整体状态的普遍性指标,弱化并收敛为聚焦个别群体利益的政策工具,即通过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医疗服务、教育、住房与就业等一系列补偿性制度,转移而非根本性解决社会矛盾与阶级冲突。这一内在矛盾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局限于单一视角。具体而言:其一,单一维度,始终将效率至上奉为衡量社会福利的唯一准则。这意味着,社会状态改善举措依赖市场机制运行,借由提升经济效率来掩盖并转移社会矛盾。其二,单一群体,片面追求特定群体利益的提升。福利经济学视域下的社会福利被局限于某一阶级内部的状态改良,其所追求的效率最大化实质上是个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局限于阶级内部的改革机制,仅能改善局部社会状态,^②导致福利国家在实践中始终无法实现理论上的社会福利最优水平,反而陷入追求个别利益至上、加剧利益分配矛盾、不断建设补偿性制度以缓和社会冲突的循环之中。因此,以社会福利为核心的社会改革最终宣告失败。

基于上述理论困境,探讨提升社会福利水平,需首先厘清福利本质。具有普遍性与一般性的福利,其核心在于关注人的现实状态。马克思在论述人的现实性时指出,人事实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④一切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经济利益关系。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⑤需要满足的方式必然产生相互关系。当人“不仅本能地要求满足生活的需要,而且也感到需要满足自己权利的要求”,^⑥利益便成为需要满足的具体对象和载体。因此,人的现实状态与利益密切相关,并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作为特定社会关系的结合体,构成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动机与准则,体现人与社会互动关系;二是表征包含基于财富占有的物质需要和基于权利、自由与平等的更高层次需要的满足程度。故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福利的本质是利益。

进一步言之,利益本身只是静态结果,唯有当利益需求被切实满足时,观念中的利益才能转化成现实利益,成为表征人现实状态的福利。此转化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⑦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从事最劳累、最

① A. Sen, “Personal Utilities and Public Judgements: Or What's Wrong with Welfare Economic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89, no. 355 (1979), pp. 537–558.

② 高夫:《福利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古允文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年,第163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1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⑤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6页。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① 换言之,资本主义福利分配并非基于社会实际利益需求,而是因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高度不平等,形成结构性利益分配不公平,造成资产阶级的绝对富有和无产阶级的极端贫困,加剧社会群体间利益矛盾。因此,福利国家将社会福利分配弱化和收敛于再分配领域,试图以此掩盖生产关系中的根本问题,逃避“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的根本性变革,^②正是福利国家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综上,福利分配本质即利益分配。

鉴于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以及对社会福利目标期望的本质分歧,福利经济学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基于此,本文选择契合中国国情,并能系统阐述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对话视角,在回应福利经济学内在矛盾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横纵交织的网络状社会福利理论框架(见表1),系统探讨如何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这一关键问题。

表1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建构

	福利经济学理论框架	福利经济学理论框架局限性	对福利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突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
框架结构	“个别群体+单一维度”框架	未顾及全体人群福利需求,存在固有生态短板	构建横向逻辑:面向社会全体,基本生存、人的发展、自然生态三个层面递进展开	“横向逻辑+纵向逻辑”网络状框架
		单纯追求效率,规避推进社会公平的制度安排	构建纵向逻辑: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两条主线协同作用	
评价维度	以个别群体利益变化为标准	社会福利被弱化和收敛于对个别利益的转移与调整,陷入个别利益至上、利益分配矛盾加剧、补偿性制度建设与社会矛盾缓和的循环	社会福利反映社会整体状态,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故福利的本质是利益,福利的分配本质上是利益的分配	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两条主线分别作用于三个层面,以横纵交织的动态演变为标准

首先,该框架的横向逻辑聚焦人的多维需求,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核心,以探讨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按照基本生存、人的发展、自然生态三个层面递进展开。此横向逻辑突破福利经济学以个别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局限,克服其忽视全体社会成员物质与精神需求的缺陷,并规避因遵循资本逻辑引发生态破坏的不可持续社会发展模式。其中,基本生存是社会福利的基础层面,聚焦人与自身的关系,强调个体基本需求的满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人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③ 为了“创造历史”,人类首先必须能够生存。因此,社会福利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人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5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的基本生存条件,以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需要,维系“原有个体生命的再生产”和“新的个体生命的再生产”。^① 人的发展是社会福利的核心层面,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价值目标。马克思认为,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开启,“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② 人对能力与社会关系的自由追求,推动人的发展与社会状态改善。^③ 自然生态是社会福利的外部边界,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二者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存在唯物辩证关系:一方面,人无法脱离自然界而单独存在,始终受到自然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与自然进行物质转换以满足自身需求。可见,自然生态既为社会福利提供必要物质资源,还界定了其水平上限。

其次,该框架的纵向逻辑由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平两条主线构成,二者协同作用,形成完整逻辑结构,超越了福利经济学以效率至上为单一视角的局限性,并克服了其规避公平制度安排的根本缺陷。社会利益是社会福利的本质,也是社会状态变化的根本动力。以利益为直接驱动力的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为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提供持续的物质基础与动力支持。区别于福利经济学局限于对少数人群个别利益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同利益,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④ 亦即社会利益。社会公平聚焦于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涵盖要素所有权归属与物质资料分配的制度设计,是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的有机统一。^⑤ 在起点上,通过平等的所有权与分配权,保障社会成员拥有均等的发展基础;在过程上,通过机会均等与公平竞争,实现个体能力的充分发挥;在结果上,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确保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成果共享。

最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揭示了理论框架横纵交织结构的动态演变,阐释了社会福利的变化方向与制度演化机制。马克思指出,一定时期内“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⑥ 但若生产关系未能及时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则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乃至整个社会的前进。^⑦ 换言之,福利经济学追求效率至上与个别利益最大化,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福利,但当生产关系固化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532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③ 陈新夏:《人的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9卷第3期,第76—85页。

④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7页。

⑤ 文正邦:《公平与效率: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矛盾》,《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第55—61页。

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3页。

⑦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式”而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福利终究难以达到其所期望的最优水平。^①因此,考量社会福利的变化需把握三点:一是将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两条主线同时纳入社会福利的研究范围;二是在任一时点,两条主线会分别作用于社会福利的三个层面,引发社会福利的新变化;三是在特定时段内,两条主线持续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福利三个层面的递进演化,形成横纵交织的动态过程,促使社会福利持续变迁。

在农业经济时代,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关系以土地所有制和家庭劳动为主导。在此经济形态下,社会福利聚焦于基本生存层面,两条主线的矛盾运动尚未触及人的发展层面,对自然生态层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过度依赖自然条件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工业革命推动了机器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逐步形成。在此经济形态下,两条主线的巨大变革使社会整体摆脱了基本生存困扰,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福利需求,两条主线开始作用于人的发展层面。同时,机械化的生产减轻了对自然条件的直接依赖,但在持续开发和索取自然生态的过程中引发生态破坏,导致自然生态层面的社会福利发生新变化。从农业经济时代到工业经济时代,两条主线的矛盾运动作用于社会福利的三个层面,推动社会形态变迁,社会福利水平呈现出螺旋上升的演进趋势。当前,人类社会已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全面改造,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跨时空协作引发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此背景下,两条主线的持续矛盾运动分别作用于社会福利的三个层面,将深刻改变社会福利的内涵与外延,使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呈现出新变化。

二、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双重变化

数字经济时代以新知识、新创造和复杂产品的再生产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推动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型劳动力的协同合作,显著区别于工业经济时代以“身高、体重和等级衡量成就”的物质生产与分配逻辑,^②标志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转型。新马克思主义学者雅安·布当将这一转型的核心特征与根本动因概括为“非物质性”。^③他认为,“非物质性”以知识、信息、符号、文化和社会关系为核心价值来源,强调无形资产的主导地位,体现生产内容、劳动形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去物质化特征,具体表现为虚拟性、跨时空性、共享性和个性化等特点。“非物质性”深刻重塑了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这两条主线,推动二者发生重大变革。当两条主线作用于社会福利的三个层面时,社会福利突破了物质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局限,拓展至由知识、体验与情感衍生的主观满足感与幸福感,涵盖产品与服务获取的便捷性、普惠性等维度,形成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新变化。

(一)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系统改善

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实现飞跃式发展,非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占比显著提升,推动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1页。

② 杰里米·里夫金:《使用权时代:整个人生皆为付费体验的超级资本主义新文化》,苏京京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48页。

③ Yann Moulier 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p. 50.

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革,进而推动社会福利在三个层面的发展与演进,引发社会福利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具体体现为社会福利总量的提升与结构的优化。

首先,社会福利总量提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生产规模,极大丰富了物质产品与服务;同时,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催生出具有虚拟性的非物质产品与服务,并逐渐成为影响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供给的关键要素,有效缓解了物理空间局限性与物质资源稀缺性,满足了基本生存和人的发展层面的福利需求。当前,淘宝、京东等头部数字平台,以及抖音、小红书等直播电商平台,已成为获取基本生存层面社会福利的主要渠道,其线上零售额占比高达30%。^①依托数据构建的数字空间,^②这些虚拟平台突破了传统零售的物理空间和物流约束,持续扩大社会福利供给规模。此外,通过非物质化操作,部分满足人的发展需求的福利产品与服务得以长期存储于数字平台,凭借低边际成本和高复制性被反复利用,极大扩展了社会福利的供给范围。例如,在“互联网+教育”领域,我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已达100%,全面实现了线下多媒体教学与线上教育融合的泛在化学习环境,^③使原本稀缺的教育资源突破了特定地区或特定人群的限制,并以非物质形式在数字平台上实现长期保存与反复使用,显著提升了社会福利水平。

其次,社会福利结构优化。数字经济时代技术革新的频率显著提高,为满足社会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福利需求,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推动福利产品与服务向个性化与共享性转型。一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摒弃了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的福特制模式,人们依托大数据与智能算法发展反向定制、个性化设计与柔性化生产,通过精准细分需求实现社会福利供需的高效匹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发展型和享受型需求比重持续上升,^④共享出行、在线旅游等非物质形态的社会福利服务兴起,以开源形式在网络社区中公开,供成员免费获取使用权,形成以短期体验而非长期保有为核心的新型消费模式,有效契合当前社会福利需求升级的趋势。

(二) 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利益分化

伴随社会利益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公平机制发生变化,并深刻重构和影响社会福利的三个层面,从而改变社会福利水平。这种改变具体表现为劳资关系和国际关系维度上的福利分配两极分化。

首先,劳资利益分配博弈趋于激化。^⑤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算法和知识产权等非物质要素主导劳动生产与价值分配格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提升资本有机构成,扩大以数字资本为代表的资方优势,降低普通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加剧劳资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突出表现为劳动力技能供需失衡。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我国高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超过1.5,而占失业人群55%的低技能劳动者因缺乏可被剥削的剩余价值

^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第53次),2024年3月22日,<https://www.cnnic.cn/n4/2024/0322/c88-10964.html>,2025年1月4日。

^② 吴风:《网络传播学:一种形而上的透视》,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4年,第156页。

^③ 《教育部:我国中小学已全部接入互联网,智慧高教平台用户覆盖166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2月9日,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606/2023/cfh_0209/baodao/202302/t20230209_1043184.html,2025年4月3日。

^④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2022年),<https://www.stats.gov.cn/sj/ndsj/>,2025年4月3日。

^⑤ 郭爱萍:《我国劳资关系矛盾及其症结分析》,《求实》2013年第12期,第49—51页。

创造能力,逐渐沦为停滞的“过剩人口”,^①被排除在数字生产和利益分配体系之外,^②致使其基本生存与人的发展需求难以满足,群体间福利差距拉大并产生代际分化。此外,在智能算法驱动下,以数字平台为代表的非物质载体催生了劳资利益分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数字资本依托数字技术和平台,通过模块化和碎片化的生产任务,构建以项目制为核心的零工生产模式,与超2亿数字零工签订弱化的劳动契约,实现“去劳动关系化”,^③导致劳动者屈从于算法的全景敞视式监控,接受数字资本的规训,陷入劳动异化与生产贫困,同时因社会保障缺失而面临失业风险;^④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利用智能算法抓取用户无意识的网络行为数据,精准预测其偏好并构建虚假需求,将用户塑造为“数字玩工”,通过占有其无偿的数字劳动引致消费异化,进一步扩大利益分配的裂痕。^⑤

其次,国家间福利分配不平等持续加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劳动力和原材料优势成为“世界工厂”,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竞争,深受不平等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发达国家更借数字技术垄断构筑数字霸权,通过制定单边优先的全球利益分配规则,持续强化国际利益分配失衡的局面。例如,美国凭借技术先发优势占据全球芯片和软件市场70%的份额,远超我国10%的占比,^⑥并依靠研发主导权推进数字殖民与算法输出,固化产业链依附关系,将31家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实施技术封锁以维系其霸权地位。此外,数字霸权国家还以隐蔽的方式实施数字资源掠夺和数字精神控制,通过AI大模型向全球用户提供符合其个性特点、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内容,“实现对人的主体性控制”,^⑦使其在无意识中沦为数字奴隶,^⑧扭曲人的全面发展需求,主导人的发展层面的福利分配,引发新的不平等。同时,以绿色技术为名推进自然资源掠夺与生态负转嫁,不仅借“技术脱钩”实现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单向攫取和无限开发,^⑨其数字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的高能耗也加速了人与自然物质代谢关系的破裂和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更有甚者,为维持现有繁荣,通过转移高污染产业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迫使全球承担发展代价,彻底暴露了数字霸权下系统性新殖民主义的本质。

三、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提升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和国家战略全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数字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6页。

② 《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2016年11月22日, https://www.soc.tsinghua.edu.cn/_local/4/E6/DA/A12EB75B9D564353167D4F107C5_D711D7DB_79EC7D.pdf?e=.pdf,2025年4月6日。

③ 姚建华、苏熠慧:《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29页。

④ 《零工市场将被纳入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024年1月8日,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1/content_6924854.htm,2025年4月3日。

⑤ 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第196—206页。

⑥ 张勇、路娟:《美国芯片霸权的内在逻辑与演进机制》,《宏观经济管理》2023年第1期,第83—90页。

⑦ 李江静:《数字帝国主义算法控制下的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7期,第120—128页。

⑧ 王海建:《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及其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第128—137页。

⑨ 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王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第25—30页。

经济时代，“增进民生福祉”需要统筹兼顾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两条主线，精准破解二者在基本生存、人的发展、自然生态三个层面作用所产生的新矛盾，推动社会福利横纵交织结构的良性演进。基于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福利的双重变化，本文提出以下社会福利提升路径。

首先，坚持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并重的基本原则。理论与实践证明，提升社会福利必须协同推进社会利益与社会公平。我国始终将生产力发展置于经济建设首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数字经济时代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① 区别于高投入与高消耗的传统生产力发展模式，新质生产力通过融合掌握数字技术的新型劳动者、智能化的新型劳动资料与以数字空间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形态，依托高质量要素投入与科技创新驱动，实现社会利益乘数式增长。^② 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区别于资本主义奉行的丛林法则，我国在推动社会公平上具有根本的制度优势，并“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③ 确保人民成为社会公平实践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落实该基本原则需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在激发经济活力中保障公平正义。二是推进社会福利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突破数字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加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数字经济与产业经济融合；构建以提升社会利益和改善社会公平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健全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完善数据确权与竞争公平制度，深化收入分配改革以实现劳动报酬与生产率同步提高，建立覆盖全数字经济活动的新型税制并推广数字化精准帮扶机制。

其次，以劳动技能治理为手段，确保基本生存福利人人可及。数字经济时代，非物质性虽缓解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资源限制与空间束缚，使社会福利供给实现人人可得，但结构性失业与低社会保障覆盖率加剧了群体间、区域间、代际间的利益分化困境，基本生存福利尚未实现人人可及。破解此局，需构建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三方协同的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治理机制，具体来说：一是劳动者应主动调整就业预期与偏好，并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与市场需求的适配度。二是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求职平台、校企合作等渠道提供劳动力需求信息，畅通信息共享机制，并建立与学校、政府、行业协会的职业培训合作机制，尤其需针对专业性强、流动性低的岗位开展行业内部培训。三是政府强化服务职能，在尊重市场规律前提下提供协调服务与财政支持，兜底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重点完善零工劳动法律法规，并探索数字零工的社保参保模式，以提升社会保障覆盖率。

再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建人与技术融合共生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的终极追求，体现为个体对能力拓展、价值实现与自我解放的深层需求。在数字经济时代，虽然非物质社会福利的极大丰富带来了多元化的福利获取渠道，但技术进步的代价不容忽视——过度技术依赖导致个体行为异化，削弱人的主体性，最终阻碍社会福利水平提升。因此，需要在人的发展与技术进步间构建融合共生的关系，具体路径需双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 周文、许凌云：《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改革》2023年第10期，第1—13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轨并进：一是健全数字治理体系，通过政策合理规制平台发展，建立政府主导的行业统一数据平台，确保技术发展服务于人；警惕数字文化殖民主义与数字拜物教，及时消弭消费主义、民粹主义等错误思潮；加强国际合作，倡导开放包容发展模式，抵御数字霸权国家以技术和资本为逻辑进行的文化渗透。二是深入开展主体性教育，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健康人格，实现技术应用与伦理反思的同步教化；提升社会数字化节制能力，以抑制技术滥用与信息茧房效应；强化科普教育增强科学认知与信息辨伪能力，构建人与技术协调发展的新生态。

最后，以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统筹经济社会进步与自然生态保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唯物辩证关系决定了维持自然生态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必要性。当前我国虽已进入绿色发展新阶段，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尚未完全脱钩，叠加发达国家自然资源掠夺与生态负担转嫁问题，迫切要求践行“致力于永续发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①的理念。为此，需要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寻求解决方案：一是坚持绿色发展模式，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以绿色生产替代粗放模式，在资本的扩张与规制间寻求平衡；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培育全民生态道德，增强节约环保意识；完善“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制度设计，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形成多元共治环境治理格局。^② 二是协调各国间生态利益关系，完善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国际环境合作联络机制，积极防范跨界污染传输风险；坚守发展中国家地位，在国际环境公约谈判中切实维护应有权益，抵制生态霸权主义与保护主义，维护国际环境合作公平秩序；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坚持包容互鉴、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传播全球生态文明观，构建人类绿色命运共同体，实现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共赢。

Improvement Pathways for Social Welfare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LYU Shoujun, WANG Yiyi, YANG Rou

Abstract: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stablished “enhancing people’s wellbeing” as a core objectiv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wever, Western welfare economics, centered on efficiency supremacy and individual profit maximization, proves inadequate in elucidating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China’s social welfare dynamic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novative network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three horizontal dimensions—basic survival, human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ecology—while vertically traversing dual

^① 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3年第33期，第5—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422页。

pillars: social benefit and social equity. Findings reveal dual dynamics of social welfare transformation: the social benefit dimension exhibits increased aggregate welfare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whereas the social equity dimension manifests a distributional polarization. Consequently, improving China's social welfare necessitates: balancing social benefit with equity, strengthening labor skill governance, fostering human-technology symbiosis, and coordinating economic-ec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igital economy; social welfa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mprovement pathway

(责任编辑:秦川申)